

东下冯文化的源流及相关问题

□ 于孟洲 夏 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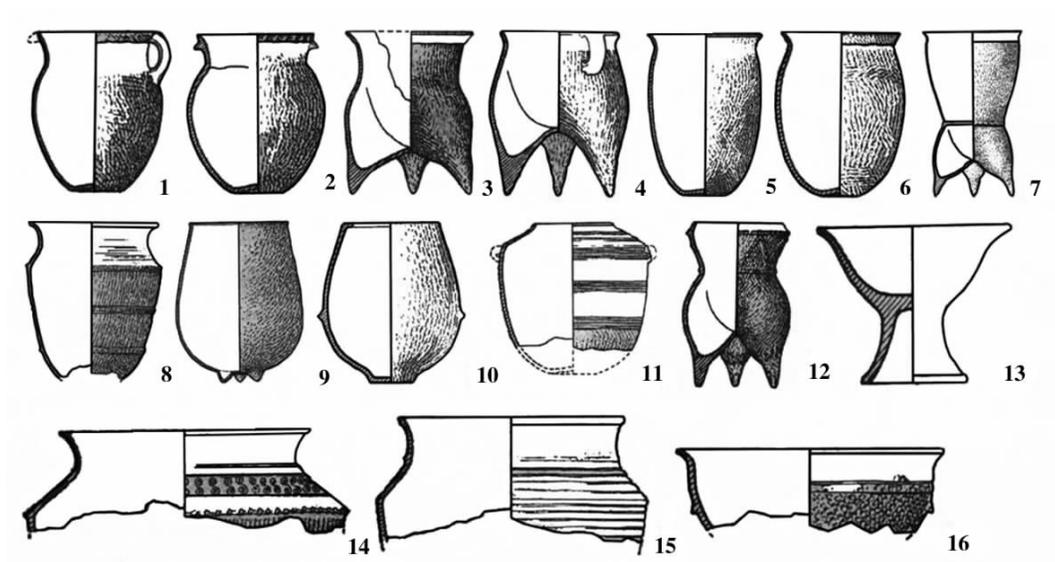
1988年,郑杰祥先生首先用东下冯文化来指代晋西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将垣曲境内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也包括在内^[1]。后来张立东先生也赞同使用东下冯文化的命名,但认为垣曲丰村H301所出遗存应归入二里头文化^[2]。我们基本同意张立东先生的看法,认为东下冯文化是一支独立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地域仅限于晋西南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不包括垣曲境内(图一)^[3]。

1959年,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史料的研究,提出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是探索夏文化应特别注意的两个区域之一^[4]。带着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于1959~1963年间,对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涑水流域、汾水下游(临汾以南)及浍河、潞河流域做了较详细的调查工作,并于1973、1977、1980和1982年在该地区又进行了多次补充调查和重点复查,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42处^[5]。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山

西实习组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合作,在翼城、曲沃两县进行了一次复查与试掘工作,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有翼城苇沟、南石、曲沃曲村^[6]等。临汾地区文化局于1985年10月为配合侯月铁路的铺设,对侯马、曲沃、翼城三县市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复查与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29处^[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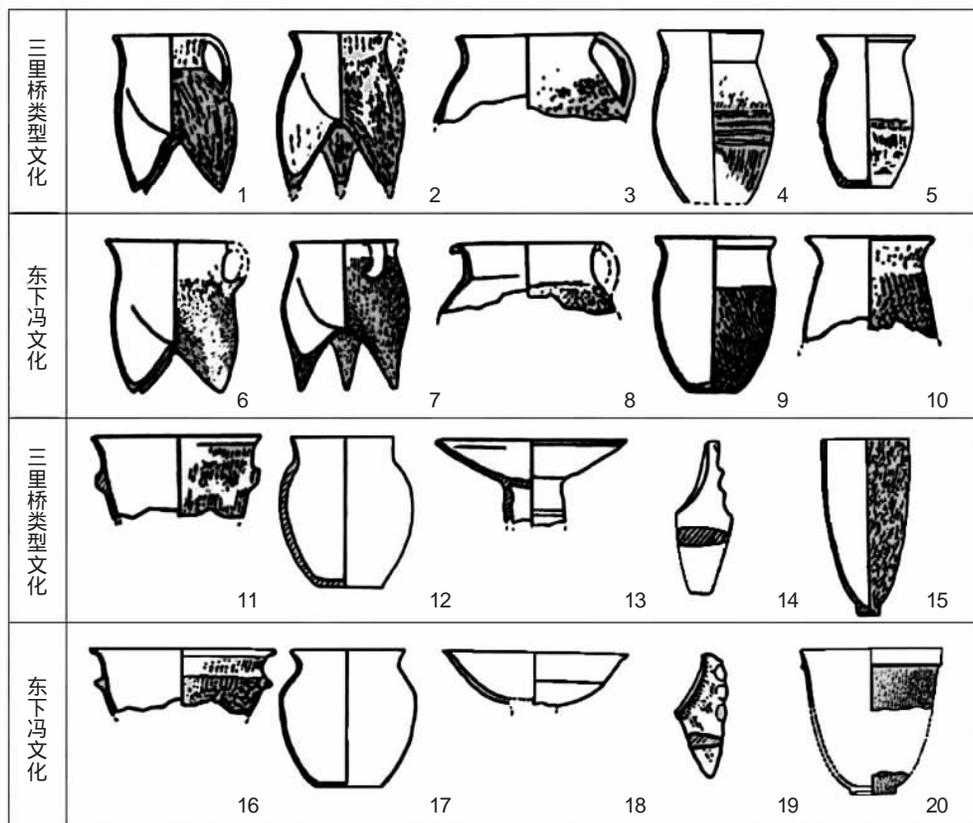
目前,晋西南地区发现的东下冯文化遗址不下几十处^[8]。经清理和发掘的有夏县东下冯^[9]、永济东马铺头^[10]、襄汾大柴^[11]、曲沃曲村、翼城苇沟、南石^[12]、感军^[13]、侯马乔山底^[14]等。

关于东下冯文化的渊源主要有如下几种看法:其一,东下冯文化主要是承受晋南晚期龙山文化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汾河以北晚期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15]。其二,东下冯文化是在继承三里桥类型文化的基础上与东方二里头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支新的文化类型^[16]。其三,东下冯文化的形成很可能就是以豫西为中心分布区域的二里头类型文化



图一 东下冯文化陶器图

- 1.单耳罐(H402 :23) 2.双釜罐(H402 :1) 3.高领鬲(H61 :2) 4.单把鬲(H41 :40) 5.6.深腹罐(H9 :121、T1012○4 :93) 7.甗(T261○2B :3) 8.大口尊(H413 :102) 9.10.蛋形瓮(H23 :2、H64 :15) 11.敛口瓮(F1 :4) 12.敛口甗(H505 :3) 13.豆(M515 :1) 14.15.折肩罐(H42 :1、H1 :12) 16.盆(T4451○3C :119) (以上陶器均为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



图二 东下冯文化与三里桥类型文化相似器物对比图

1、2、6、7.单把高 3、8.单耳罐 4、9、5、10 深腹罐 11、16.盆 12、17.小口尊 13、18.豆 14、19.鼎足 15、20.缸
1、2、3、15. 夏县东下冯(采、H207 :1、H240 :27、T209③ :3) 11. 垣曲龙王崖(T211① :3C :40) 4、5. 陕县三里桥(B6CH224 :03、E1H109 :10) 12、13.垣曲古城东关(IH265 :62、IH140 :97) 14.芮城南礼教(H116① :13 :) 6~10、16~20. 夏县东下冯(H413 :8、H41 :40、H1 :14、H407 :3、H406 :12、H36 :7、M511 :3、H1 :19、H1 :17、F568 :12)

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晋南地区传播并和当地文化逐渐融合的结果。东下冯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来源于二里头类型,它同时吸收了光社文化的一定影响^[7]。另有学者在研究晋南龙山期文化与东下冯文化的关系时指出,晋南龙山期文化的两个类型(即陶寺文化和以东下冯遗址龙山晚期为代表的遗存——笔者注)都不是后者形成的渊源,仅是吸收其部分因素^[8]。本文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再对东下冯文化的渊源及流向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东下冯文化的渊源分析

东下冯文化形成之前,分布于这一地区的是三里桥类型文化。其主要遗址有夏县东下冯^[9]、芮城南礼教^[20]、垣曲古城东关^[21]、龙王崖^[22]、丰村^[23]、河南陕县三里桥^[24]等。

单把高、单耳罐是三里桥类型文化的典型器物,另外,卷沿弧腹盆、卷沿深腹罐、浅盘弧腹豆、素面小口尊、斜直腹缸、外侧带凹窝的鼎足等均见于三里

桥类型文化。这群器物为东下冯文化所继承(图二),并且其在东下冯文化中所占比例较大,以东下冯遗址所出单耳罐为例,一至四期在陶器群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0.5%、18.8%、21%、8.6%(数据采自《夏县东下冯》附表)。卷沿弧腹盆的数量也较多。

分布于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目前已经发掘的主要遗址有襄汾陶寺^[25]、曲沃东许^[26]、方城^[27]、翼城南石^[28]、洪洞侯村^[29]等。东下冯文化中的簋(如东下冯H1 :8)、单耳杯(如东下冯M511 :1)、卷沿深腹盆(如东下冯H10 :3)等,在陶寺文化中均可找到相似器物,应为承袭陶寺文化的同类器而来。该群器物数量极少,且只出现于东下冯文化的一、二期,三、四期不见。这种情况应引起注意,它表明陶寺文化在构筑东下冯文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甚微。

另外,东下冯文化中的少量卷沿深腹罐(如东下冯H406 :12)的同形制器物也见于陶寺文化中(如南石大口高领罐采25),我们不排除是受陶寺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可能。

东下冯文化中的双釜罐曾有学者认为源于朱开沟文化中的同类器^[60]。但朱开沟文化的带钮罐,口部外侧附加四个对称的长方形器钮(釜)^[61],与东下冯文化中的对称舌形双釜罐在釜的数量及形制上均有所不同。陶寺文化中已存在器物口沿设对称双釜钮的作风,如陶寺平底盆 H 302 27^[62],并且口沿外附泥片及唇部按压花边的做法,在陶寺文化中也不乏其例,所以这种双釜罐为晋西南本地起源的可能性很大。

东下冯文化中的折肩罐(如东下冯 H 1 :12)与晋中地区龙山文化中的尊如乔家沟 H 4 3、H 1 6^[63]形制大体相似,可能是受后者影响而产生的。

东下冯文化中的蛋形瓮与白燕文化^[64]的同类器相似,但蛋形瓮的各种形制在此前的晋中地区龙山文化^[65]中多数都已存在,所以不排除这类器物是受晋中地区龙山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可能。

东下冯文化中的双釜鬲,敛口罍在晋中地区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和三里桥文化中均有发现,敛口瓮在三里桥文化和晋中地区龙山文化中也都有发现,目前暂不便进一步确指这些器类究竟来自其中的哪一种文化。

二里头文化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中心分布区为伊洛颍汝地区。由于地域毗邻等原因,东下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均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东下冯文化一期中的深腹盆形鼎(如东下冯 H 1 :11)、折盘豆(如东下冯 H 1 :9)、小口罐(如东下冯 H 42 :1)、罍(如东下冯 H 42 :4)等器物都可在二里头文化中找到同类器,且多为二里头文化的较典型器物。东下冯文化一期中的这些器物可以看成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产物。结合《夏县东下冯》所列附表和报告正文介绍,这群器物在东下冯文化一期陶器群中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一左右。可以看出,在东下冯文化的形成中,二里头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中地区的白燕文化的重要遗址有汾阳北垣底、杏花村、孝义薛家会、娄烦罗家曲、何家庄^[66]、忻州游邀^[67]等。白燕文化在东下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东下冯文化一期中的卷沿弧腹豆(如东下冯 M 511 :4)、甗、带捆绑痕的实足跟等可在白燕文化中找到同类器,且在本地的龙山时期文化中找不到源头,应为受白燕文化影响的结果。蛋形瓮也可能为受白燕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该群器物中的甗一直为东下冯文化中的重要炊

器,在东下冯文化一期中所占比例为 9.2%,所以白燕文化对东下冯文化的形成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里桥类型文化、二里头文化和白燕文化对东下冯文化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文化成分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三里桥类型文化和白燕文化,但这三者中没有一种占居绝对主导地位。东下冯文化应是在继承本地三里桥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二里头文化和白燕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另外,晋中地区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也对东下冯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用都不大。

二、东下冯文化的流向探讨

晋西南地区自东下冯文化之后,早商文化接踵而至,分布范围基本覆盖了东下冯文化的分布区。王立新先生称晋西南地区的早商文化为东下冯类型早商文化,并将东下冯类型早商文化的陶器分为四群,其中 B 群属源于东下冯文化的因素,包括蛋形瓮、敞口斜腹盆形甗、单耳罐、双釜罐、多孔甗、盘等器类。C 群器物则属于东下冯文化与早商文化二里岗类型的共同因素,而更接近于二里岗类型的同类器^[68]。此外我们发现东下冯类型早商文化中的大口罐、单孔甗、单耳杯、四足方杯、圆柄形器盖、盅等在东下冯文化中也有发现,其中有些可能也是继承东下冯文化发展而来的。不过,东下冯类型早商文化中吸收东下冯文化而来的因素毕竟只占少数,说明两者应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此外,东下冯文化还对晋中地区的夏代遗存^[69]、下七垣文化^[40]和二里头文化^[41]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结 论

东下冯文化的形成有多支源头,但没有一支在其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可看出文化形成的复杂性。若再细致分析陶器群,不难看出如下两点:

(1)东下冯文化继承三里桥类型文化的因素包括重要炊器单耳罐等,这是一个人群的具有标志性的器物,可看出东下冯文化与三里桥类型文化的人群有一定关系。

(2)二里头文化的西进与东下冯文化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也不容忽视。董琦先生认为二里头类型文化较早地从伊、洛地区向西发展,在三门峡地区即有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时的遗存^[42]。东下冯文化一

期遗存即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二里头文化的西进是促成东下冯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

关于东下冯文化的年代,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与二里头文化的二至四期相当^[63],即东下冯文化的起始年代明显晚于二里头文化。

我们觉得确定东下冯文化的起始年代目前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东下冯文化中有一组直接继承三里桥类型龙山文化的遗存,并且两者相似的器物又略有差别,表明两者既紧密衔接,又有早晚不同。

(二)东下冯文化一期中即有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相似的同类器物,如东下冯遗址一期的鼎 H1 :1、双釜罐 H1 :6 分别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鼎 T104 :51、长颈圆腹罐 T104 :21 相似,东下冯遗址的双釜罐 M 503 :1 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长颈圆腹罐 T104 :11 相似。根据《偃师二里头》,T104 层属于一期较早的单位^[64]。

(三)从东下冯文化形成时的文化格局看,东下冯文化是在继承当地的三里桥类型龙山文化的一部分因素的基础上,与二里头文化及晋中的白燕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而形成的,当然也同时吸收了陶寺文化和晋中地区龙山文化的少量因素。可以认为二里头文化因素注入晋西南地区是东下冯文化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综合来看,东下冯文化的起始年代是与二里头文化基本同时即在二里头文化一期,若从两者形成年代的相对早晚看,前者应稍晚于后者。

苏秉琦先生曾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中的中原区系就包括了关中(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区域^[65]。晋西南地区在先秦时期的很长时期内都是一个文化交汇的中心区,这一方面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该区域富于铜、锡、铅和盐等重要的自然资源存在紧密联系。当然,我们目前还缺乏更多的材料来探讨这些自然资源的最初利用年代及不同时期的利用情况。但是,我们从考古材料上可以明显看到,该区域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夏商时期都是重要的文化分布区。无论是龙山时期的陶寺城址^[66],还是早商时期的东下冯商城^[67](垣曲境内还有垣曲商城^[68]),都昭示了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程度,而夏商时期二里头文化对这一区域的强烈影响与渗透及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的产生,都

说明了夏商王朝对于晋南地区的高度重视。

晋南地区素有“夏墟”与“大夏”之称,多数学者认为这与夏人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本文所说的东下冯文化可能是唐人^[69]、唐虞族^[70]或有唐氏^[71]的文化遗存。这种对于东下冯文化族属问题认识的不同,一方面在于学者对于文献的解读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因为不同学者对于同一批考古材料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将本文所说的东下冯文化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当然也存在不同意见。相信这对于晋南地区夏代遗存的进一步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也会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考古学文化的理论问题。

尽管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但对于何者为夏文化及夏商分界等重大学术问题都还存在诸多争议。从龙山时代至夏商时期,晋南地区或与豫西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或者成为以豫西为分布中心的考古学文化的一部分,在研究上述重大争议问题上,晋西南地区的东下冯文化无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考察对象。不过,我们注意到和二里头文化相比,东下冯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的都还远远不够,相信随着材料的增多,我们对于东下冯文化的认识必将会不断深入。

[1] 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2] 张立东《论辉卫文化》,《考古学集刊(10)》,地质出版社,1996年。

[3] 于孟洲《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比较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春秋》2004年第1期。

[4]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12]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冀城曲沃考古勘察记》,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

[7] 张文君、高青山《晋西南三县市古文化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8] 此处依据材料除[5][6][7]外,还有: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年第3期;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乔山底遗址1989年区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6年第2期。

[9][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10][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年第3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大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14]同[9]。

[15]王克林《试论东下冯类型文化的渊源》,《文物春秋》1993年第3期。

[16]郑杰祥《二里头二期文化和后羿代夏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17]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18]吉琨璋《晋南龙山期文化同东下冯类型的关系》,《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19]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南礼教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6期。

[21]张素琳、佟伟华《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龙王崖遗址的两次发掘》,《考古》1986年第2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25][46]A.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

[2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查、发掘简报》,《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曲沃县方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4期。

[2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2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洪洞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0]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3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33][36]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88年。

[34]严志斌用白燕文化来命名晋中地区的夏代到早商时期的遗存,见《试析长治小神遗址的二里头时期遗存》,《北方文物》1999年第1期。

[35]可参看A.同[33]。B.晋中考古队《山西忻州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4期。

[37]晋中考古队《山西忻州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4期。

[38]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73~174页。

[39]可参看:A.同[33]。B.宋建忠《晋中地区夏时期考古遗存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C.侯毅《试论太原东太堡类型》,《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40]A.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B.王立新、朱永刚《下七垣文化探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C.张立东《论辉卫文化》,《考古学集刊》第10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

[41]A.同[3]。B.于孟洲《东下冯文化的相关问题》,《川大史学·考古学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42][51]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

[43]如A.同[17]。B.李维明《再议东下冯类型》,《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7、51、52页。

[4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48]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一)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49]参见张立东《山西夏都考辨》,《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50]参见李先登《对夏文化探索若干问题的看法》,《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

(于孟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夏微,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